

1961年蒙古加入联合国与“重要问题”提案中的美台交涉

张绍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

摘要:1961年美台间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和蒙古加入联合国的问题,龃龉不断,反复交涉。蒋介石为了维护台湾当局的中国正统地位,本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对肯尼迪政府态度强硬。肯尼迪政府出于政治上遏制中国的目的与台湾当局在阻止中国获得联合国席位问题上高度共识,但在具体策略上则不乏分歧,最后以一张“空头支票”换取了蒋介石的妥协。这表面上似乎是蒋强硬政策的胜利,但掩盖不了美台间的矛盾。

关键词:中国代表权 联合国 美台关系 肯尼迪总统 蒋介石

新中国成立之初即向联合国提出要求:将台湾当局驱逐出联合国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自1951年至1960年美国凭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票数优势以程序问题为由通过“暂缓讨论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简称“暂缓”提案),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亚非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美国对联合国的掌控力不断削弱,“暂缓”提案越来越难以为继。于是,1961年成为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一个关键年份。学界对此已作出了相当研究,比如牛大勇和梁志主要依据美国解密档案考察了肯尼迪政府政策演变的过程,陈红民主要依据台湾方面的资料(尤其是蒋介石日记)考察了蒋的“外交”策略与心理变化。本文在此基础上,综合美、台双方的资料,考察美台互动的过程,强调美台交涉的国际背景决定了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走向。蒋介石自以为得计的强硬政策和关键时刻的妥

协的韧性及肯尼迪政府的秘密保证都无法改变国际背景的变迁。即随着非殖民化的浪潮滚滚而来美国对联合国大会投票的控制力越来越弱,新中国日益稳固,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阵营内部不断出现调整对华政策的呼声。

一、台湾当局的盘算与美台初步交涉

鉴于现实的压力,肯尼迪政府一方面向台湾当局强调“暂缓”提案难以为继的现状,另一方面试探对方是否接受隐含“两个中国”意味的提案。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叶公超则一方面否认美方对现状的判断,另一方面坚决抵制任何含有“两个中国”意味的提案。3月24日,台湾“外交部”内部开会讨论如何应对美方的政策探询,“外交部长”沈昌焕认为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是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如接受“两个中国”则“台湾国际化”、公民投票等问

作者简介:张绍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留日博士。

牛大勇:《肯尼迪政府与1961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之争》,《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梁志:《论196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中的蒙古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陈红民:《蒋介石与1961年联合国“外蒙入会案”》,《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2期。

FRUS, 1961-1963, Vol. 22,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p.4-6, 33-36; 周谷编著:《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89、290页。

题会继之而来,涉及基本国策,必须坚决反对,应向美方表明“如非全璧,宁弃勿取”的决心,希望美方继续使用“暂缓”提案。会议主持人“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最后表态赞成沈的意见。3月26日夜,“副总统”陈诚召集“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王云五、“行政院”政务委员王世杰、侨务委员长周书楷、沈昌焕、返台北述职的叶公超等人开会,叶公超表示:“在客观方面,如缓议案无法运用时,我国应提出替代方案,不能坐以待毙。我若坚持缓议案,则必须想到该案失败后对我严重之后果。在运用方面我是否考虑采取美国新方案一部分,俾达到阻匪参加联合国之目的。”而张群、王云五两人发表的看法与沈昌焕的上述意见接近。

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召见张群、沈昌焕、叶公超三人,在听取汇报后指示:

(甲)对我代表权问题,美国在心理上已生失败主义,乃设计造成“两个中国”之布局,至于不能获得支持票,乃一种说法而已。(乙)将来无论用缓议案或其他方法,均须美国有决心。否则,我自行拉票,必极困难。(丙)接受或默认两个中国之安排,不但政府何以自处,我们应告美方,我们必要时决心退出联合国。倘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请匪入会,则我决心退出。当然我们要奋斗到底,以保持我代表全中国之地位,使共匪不能入会。技术上各种方式,你们多研究好了。(丁)沈部长分析我失掉联合国席次后,所将发生之种种不利后果,自然要考虑。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外交家自应从国际角度多加研究报告政府。万一我不得已退出

联合国,以后如何应付,乃是我总统的责任了。(戊)倘若我退出而共匪加入联合国,在国际上绝非一件小事情。对远东及整个世界均将产生重大之变化,对美国及联合国亦将发生严重之影响也。

蒋介石从维护“中华民国”的正统地位出发,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他对美国既依赖、利用又提防、斗争的两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根据蒋的指示,3月30日沈昌焕提出了台湾当局的正式立场,坚决反对“两个中国”,重申两害相权取其轻,必要时宁可退出联合国也保持尊严。对于具体策略,应首先劝说美方继续使用“缓议”提案,但不排除使用需三分之二支持票才能通过的“重要问题”提案。4月1日,台湾当局又发电给回美返任的叶公超,训令他在对美交涉时贯彻上述正式立场。同日,蒋介石给肯尼迪修书一封,强调“汉贼不两立”的立场,绝不接受任何“两个中国”的安排。3日,叶公超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呈递了蒋给肯尼迪的信,并重申了台湾当局的立场。腊斯克对此表示不满,指出各国政府不能接受台湾当局制造的两个幻象:台湾当局是实际上统治全中国的政府,国共内战尚未结束,台湾当局有朝一日将反攻大陆。而叶公超对此并没有严词反驳。9日,副国务卿鲍尔斯发表了隐含“两个中国”意味的谈话。12日肯尼迪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用了“台湾”而未使用“中华民国”来称呼台湾当局,话里话外透露出“两个中国”的意思。17日,肯尼迪总统复信蒋介石,质疑“缓议”提案的有效性,希望台湾当局与美方一同探讨其他提案的可能性。面对美方上述一

《关于我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因应方策讨论会记录》(1961年3月24日),《中美两国有关重要问题(第1册)》,台湾“外交部秘书处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805/000108。转引自王正华:《蒋介石与196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国史馆馆刊》第21期(2009年9月)。

《沈昌焕呈总统:副总统与叶大使会谈记录》,民国50年3月30日,侍秘042,国史馆藏:《蒋中正文物》,档号080160第20卷,编号08A-0 1526;周谷编著:《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62-3 65页。

《总统召见叶大使公超谈话记录》,民国50年3月30日,侍秘043,国史馆藏:《蒋中正文物》,档号080160第20卷,编号08A-0 1526;《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第366-3 71页。

王正华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中国代表权》,国史馆,2001年版,第124-1 27页。“重要问题”提案本身并不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支持,只是一旦通过,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将被视为重要问题,需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即提高改变联合国代表权的表决门槛。

《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第328页。

FRUS, 1961-1 963, Vol. 22, pp46-4 8;《联合国大会第十六届常会中国代表权问题因应经过节要》,节要条字第二十五(五十一)号,“外交部条约司”编,国史馆藏“外交部”移转档案《匪共与联合国及我国代表权问题案》,172-3(目录号)/5868(案卷号)。

《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第315页。

FRUS, 1961-1 963, Vol. 22, pp50-5 1.

连串举动,21日沈昌焕在与美驻台大使庄莱德的会谈中,强调光复大陆是台湾当局不可动摇的“国策”,显示出对“两个中国”的强烈戒心。庄莱德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汇报中,强调美国一定要慎重处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一招走错就会对美台关系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

鉴于台湾当局的上述表态,美国国务院制订了“一国两府”的草案,希望能得到台湾当局的同意,借此逼迫中国拒绝加入联合国,把责任转嫁到中国头上。实际上,“一国两府”还是“两个中国”的变种,也难以得到台湾当局的同意。此时的肯尼迪总统开始意识到对华政策中牵涉国内政治问题。1961年4月,“百万人委员会”在全美各地展开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签名活动。“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7月25日在美国参议院的表决中以76票赞成0票反对而通过,8月31日在众议院以395票赞成0票反对而通过。盖勒普民意测验表明,针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议题,65%的美国人表示反对,只有18%表示支持。

二、围绕蒙古加入联合国及美蒙关系的美台龃龉

就在美台双方开始探讨如何应对当年联大上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又出现了蒙古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情况更加复杂。1953年2月台湾当局宣布废除1945年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撤销之前对外蒙独立的承认,因此在联合国安理会对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行使否决权。1960年底毛里

塔尼亚独立后即申请加入联合国,苏联将毛里塔尼亚和蒙古加入联合国捆绑到一起,成为一个议案。毛里塔尼亚背后的原法属殖民地组成的布拉柴维尔集团的11个非洲国家则将毛里塔尼亚能否加入联合国与中国代表权问题一并考虑。即,如果蒙古和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在安理会表决中被台湾当局否决,这11个国家将在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反对台湾当局甚至不惜与之断交。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内部也在探讨与蒙古建交的问题,得出倾向于采取承认蒙古并同意其加入联合国的立场。4月28日,沈昌焕在召见庄莱德“大使”时表示,台湾当局无论如何都会在安理会对蒙古进入联合国的申请行使否决权。6月9日蒋介石又给5月访台的美国副总统约翰逊修书一封,强烈反对美国承认蒙古和允许其加入联合国的考虑。他指出美国若承认“共产主义傀儡政权”蒙古就等于牺牲了反共的原则并抛弃了盟友,必将最终导致承认“中共”、“北朝鲜”、“北越”等其他“共产主义傀儡政权”。如果走上“两个中国”的道路,最后必将导致承认“一个共产党中国”的结果。^①6月20日蒋介石在召见庄莱德时,对美国的强烈不满溢于言表,他指出如果美国在蒙古问题上一意孤行,“(美国与)中华民国哪里是有着共同利益的盟友啊?分明是主仆关系啊”。^②鉴于蒋介石的强硬立场,6月29日美国国务院给庄莱德发了一封长电,指出“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策略最终会导致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为了确保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并阻止北平加入联合国,必须探

Incoming Telegram, No. 639, from Drumright, Ambassador in Taipei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 April 21, 1961, Reel 2 of 5,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China, Foreign Affairs, 1960-1963*, Bethesda MD: Marylan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以下简称缩微胶卷 1960-63)。

FRUS, 1961-1963, Vol. 22, pp66-69.

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美国国内的压力集团。

Stanley D. Bachrack, *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China Lobby" Politics, 1953-197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88, 189.

Footnote 1, FRUS 1961-1963, Vol. 22, p.103.

Leonard A. Kusnitz,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America's China Policy, 1949-1979*,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4), p.101.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2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59-511、783-786页。

“外交部条约司”编:《联合国大会第十六届常会中国代表权问题因应经过节要》,节要条字第二十五(五十一)号,国史馆藏“外交部”移转档案《匪共与联合国及我国代表权问题案》172-3(目录号)/5868(案卷号),第8-12页。

Memorandum from Foy D. Kohl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entitled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Outer Mongolia, (secret) May 2, Reel 5 of 5,缩微胶卷 1960-63; FRUS, 1961-1963, Vol. 22, pp417-419.

《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第320页。

① Letter from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to Vice-President Johnson, June 9, 1961, Reel 2 of 5, 缩微胶卷 1960-1963.

② FRUS, 1961-1963, Vol. 22, p.77.

讨有利于获得安定多数支持的提案。换言之,美国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引起‘两个中国’的事态,而是为了确保中华民国的席位,让北平政权自己承担不加入联合国的责任。具体而言,如果承认北平政权有加入联合国的资格,中华民国通过抗议表明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即可。只要中华民国不主动退出联合国,明确反对‘两个中国’的北平政权就不会加入联合国。而如果中华民国主动退出联合国,不但对中华民国自身的国际地位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将导致北平政权加入联合国,共产主义阵营的力量也会随之增强。这样既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有损于对中共的遏制政策。而对于蒙古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如果中华民国行使否决权,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也会同时被否决。因此,当表决中国代表权时非洲诸国就会对中华民国实施报复。如果事态发展到那一步,就会导致一连串严重的后果:中华民国被驱逐出联合国,很多非洲国家与中华民国断交,中共加入联合国,在不远的将来蒙古也会加入联合国。”

然而台湾当局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有增无减。6月16日,沈昌焕在“立法院”发表声明,称台湾当局将对“外蒙”采取一贯坚定的立场,但仍遭到若干“立法委员”的严词抨击:历任“外长”均反复向“立法委员”保证与美国的关系良好,但现在的情况仿佛出卖中国的雅尔塔条约重演。“倘非历任外长欺骗立法委员,即为历任外长均受美国所欺骗”。接下来,6月23日,“立法院”又通过了“对美国与外蒙傀儡政权进行建交谈判及苏俄企图挟带外蒙进入联合国问题”的决议,不但严厉批评美国政府,而且向台湾行政当局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不得已,6月30日沈昌焕在“立法院”做了题为“我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报告,坚决表示“任何企图以‘两个中国’方式解决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安排,绝非

我国所能接受和容忍”,呼吁美国政府“我在联合国之代表权问题,牵涉联合国宪章之尊严及联合国本身之前途,切勿因策略适用而放弃重大之原则”。

7月1日,庄莱德“大使”拜见蒋介石,向蒋传达了国务院的指示。而蒋丝毫没有让步,反而强调美国承认蒙古和蒙古加入联合国,对台湾当局而言是关乎存亡的问题。对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蒋坚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否定了一切含有“两个中国”意味的提案。至此,肯尼迪总统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7月9日与12日国务院以肯尼迪的名义草拟了一封给蒋介石的回信(针对6月9日蒋给约翰逊副总统的信),而肯尼迪认为国务院的回信草稿完全回避蒋信中关切的问题,对国务院表示不满。他转而请白宫的幕僚帮他拟就了一封给蒋的回信,在信中肯尼迪向蒋保证无限期推迟承认蒙古,并请蒋派遣高级代表(最好是蒋经国)访美进一步探讨蒙古加入联合国和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应对之策。

蒋阅信后向美国提议派“副总统”陈诚访美。7月31日至8月2日陈诚一行与肯尼迪、腊斯克等举行多次会谈。双方在采用“重要问题”提案上取得共识,但在如何应对蒙古和毛里塔尼亚一道申请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没能达成一致。8月9日,返台的陈诚训令叶公超:对于蒙古和毛里塔尼亚一道申请加入联合国一事,台湾当局如在安理会无法获得足够的弃权票以否决该申请,则以常任理事国身份直接否决该申请。叶公超本人希望台湾当局能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以确保联合国席位,他深知最后决策系于蒋介石一身,乃转换路径试图说服蒋改变立场。8月26日叶给宋美龄发了一封英文长电,希望借助宋美龄说服蒋介石。^①众所周知,宋美龄精通英文,是蒋介石对美外交上颇为倚重的人物。^②因资料所限,笔者不了解宋是否看到了这封信,或者看到

Telegram from Department of State to Embassy Taipei, No. 715, (secret) June 29, 1961, Folder: China / Cables, 2/61 - 8/61, Box 25, Countries, NSF, Papers of President Kennedy, John F. Kennedy Library, Boston, MA. (hereafter cited as JFKL).

①《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第377、378页,第381页,第378-380页,第389-396页。

《我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1961年6月30日《中美两国有重要文件(第2册)》,“外交部”秘书处档案,档号805/0009。转引自王正华:《蒋介石与196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国史馆馆刊》第21期(2009年9月),第113页。

Telegram from Embassy Taipei to Department of State, No. 5, (secret) July 2, 1961, Folder: China / Cables, 2/61 - 8/61, Box 25, Countries, NSF, Papers of President Kennedy, JFKL.

FRUS, 1961-1963, Vol. 22, pp.98-99, pp.95-97.

Telegram from Embassy Taipei to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 No.60, July 19, 1961, Reel 2 of 5, 缩微胶卷1960-63。

FRUS, 1961-1963, Vol. 22, pp.102-111;《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中国代表权》,第127-129页。

②周宏涛:《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469页;陈三井访问、李郁青记录:《熊丸先生访问记录》,中研院近史所,1998年,第103、104页。

后是否赞成叶的观点,甚或是否就此游说蒋。但有学者据蒋介石日记中的记载,判断蒋介石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基本上没有征求过宋美龄的意见。与此同时,美台双方以最高领导人书信往还的方式又进行了一轮交涉。但台湾当局继续坚持:无论如何,都要在安理会阻止蒙古加盟联合国。

9月6日和10日,蒋介石与肯尼迪再次书信往还,蒋强调“出于国家尊严和民族自尊心”,宁可丧失联合国代表权也要阻止蒙古加入联合国。国务卿腊斯克对此颇为恼火,向驻台“大使”庄莱德表示:如果台湾当局决心宁愿与船一起沉没也不愿在蒙古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妥协,美国则完全不负任何责任。如有必要,美国将向外界表明,尽管美国尽了最大努力但台湾当局还是在联合国采取了政治自杀行为。9月29日,腊斯克向在纽约的沈昌焕和叶公超发出了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希望台湾当局不要在安理会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而蒋介石对腊斯克也极度不满,在日记中称其为“丑”,并对美国的意图表示怀疑:“美国国务院一面宣布与外蒙停止建交的谈判,而一面又全力阻止我否决外蒙加入联合国。其意在先使外蒙入会,而后再加承认,似更为便捷。即使我再反对,亦可不理,其将说外蒙既已加入联合国,则美不能不加以承认矣。”因此,蒋认为“此一阴谋之大破,必须此次否决其加入联合国也”。之后各方讯息纷至沓来,皆对台湾当局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的拟议不利,蒋依然不为所动,在日记中表示“余惟有贯彻其既定之政策,否决外蒙,并作最后撤退联合国之准备”,“神明泰然,并未为其压迫所动摇”,并亲拟电稿,命令身在纽约的沈昌焕和蒋廷黻:“不计成败得失,必须贯

彻我中央决议方针,切勿为任何艰危或重压所动摇。”

三、第二管道的开辟与美台间的妥协

事已至此,美台间的僵局似乎已无法打开。然而在剑拔弩张之际,却突然出现了峰回路转的迹象。10月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要求美国声明其对共匪加入联合国请求时实施否决,与我对外蒙入会案放弃否决之约交换,可乎?”不知这是蒋自己脑袋里冒出的想法还是某个心腹进言的结果?从第二天的日记看,似乎是张群和王云五对蒋提出了上述建议。总而言之,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第二天,蒋即请其子蒋经国通过美中情局驻台办事处主任克莱恩绕开美国国务院,直接向肯尼迪陈述台湾当局的立场和想法。蒋介石当天在与庄莱德的会面中,也透露出立场软化的迹象。10月3日,蒋的想法进一步明确:“对否决外蒙案,必须美国公开宣布其如共匪入会讨论时予以否决。或共匪加入联合国时,美即退出之声明,则我可允其此次对外蒙案亦可不否决,作为交换之条件。”蒋出于对美国国务院的极度不信任,在继续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与美沟通的同时,逐渐将沟通重点转到刚刚开辟的第二管道上。10月5日,蒋通过叶公超向美方提出,要求“美国政府能公开保证以一切办法在联合国维我排匪,包括必要时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在内,则我对蒙案不用否决权一节始可进行”。此后,克莱恩的第二管道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台双方几经折冲,达成协议,美国通过秘密方式向台湾当局承诺:“在任
(下转第10页)

阮大仁:《由蒋中正日记去看叶公超大使去职之经纬》(三),《传记文学》第97卷第2期,第84-94页。

FRUS, 1961-1963, Vol. 22, p.127, Footnote 3; Telegram from Department of State to Embassy Taipei, secret, No. 125, Aug. 17, 1961, Folder: China/Cables, 2/61-8/61, Box 25, Countries, NSF, Papers of President Kennedy, JFKL 《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第324页。

FRUS, 1961-1963, Vol. 22, pp.134-135, 《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中国代表权》,第133页。

FRUS, 1961-1963, Vol. 22, pp.137, 138.

FRUS, 1961-1963, Vol. 22, pp.140, 141.

《蒋介石日记》,1961年9月11日之“上星期反省录”与9月15日,转引自阮大仁:《由蒋中正日记去看叶公超大使去职之经纬》(四),《传记文学》第97卷第3期,第40页。

《蒋介石日记》,1961年9月15日、20日、25日,转引同上,第40、41页。

《蒋介石日记》,1961年10月1日、2日,转引同上,第41、42页; Telegram from Embassy Taipei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 286, secret, Oct. 2, 1961, Reel 2 of 5, 缩胶卷 1960-63, FRUS, 1961-1963, Vol. 22, p.142, Note 1.

《蒋介石日记》,1961年10月3日,转引自阮大仁:《由蒋中正日记去看叶公超大使去职之经纬》(四),《传记文学》第97卷第3期,第42页。

《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中国代表权》,第144页。

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篆,投敌的青帮大亨张啸林、季云卿,击毙了投靠汪伪的汉奸何天风、吴木兰、季翔卿、楼桐等一批人。居家、医院、商店、办公室、马路边,随处都可能是汉奸丧身之地。汪伪特工进行报复,以暗杀对付暗杀。一时间,血雨腥风,骇人听闻。锄奸行动中,影响最大的是砍死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傅此前虽然四次逃过军统特工的暗杀,但1940年10月11日凌晨,还是被厨师用菜刀活活砍死。抗战时期的汉奸都没有好下场,但是,生活在南京的汪精卫等人,在华北的殷汝耕、梁鸿志等,因其所在地方政权单一,防备较易,不似上海这么复杂难防,所以,尽管爱国人士对他们同样切齿痛恨,但难以下手。大汉奸中被暗杀而死的,唯傅筱庵一人。他死在上海,折射的是上海城市特点。

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中

的这些特点与作用,交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上海这座城市,要悲壮有悲壮,要柔情有柔情,要崇高有崇高,要平庸有平庸,万象杂陈,令人目不暇接。人间一切正剧、悲剧、喜剧、荒诞剧,在这里都有上演。于是,上海被涂上神奇、怪诞、梦幻乃至幽默的色彩,难怪被日本人称为“魔都”,也难怪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李安的《色戒》,周润发领衔的《上海滩》,这些年热播的《潜伏》,都要以上海为背景。因为,很多情节在其他地方是岂有此理,在上海便竟有此事!

当然,那些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那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抗日战争中做出的不朽贡献,是包括上海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综合妙用上海城市特点的智慧结晶。

这便是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地方。

(上接第87页)

何时间,如为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而有必要并能有效使用否决权时,美国将使用该否决。”这样,10月25日安理会顺利通过蒙古和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而台湾当局故意缺席,美国弃权。之后,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重要问题”提案顺利通过。

纵观1961年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台间的折冲过程,似乎是蒋介石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式,扭转“此一已成失败之局,得转危为安”。但实际上肯尼迪不惜以否决权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的秘密保证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在草拟给克莱恩的电报中,强调存在着

很多可能无法使用否决权阻止北京进入联合国的情况:比如“两个中国”的气氛特别浓重时,或者中国代表权的席位应由北京或台北来占据的资格问题付诸表决时。这封并没有发出的电报,为此后美台就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埋下了伏笔,也暗示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归属的结局。战后伴随着去殖民化的潮流,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独立并加入联合国,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投票的能力不断下降;与此同时,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在亚非国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最后,美国政府也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台湾当局失去联合国中国代表权只是时间问题。

FRUS, 1961-1963, Vol. 22, pp154-158.

FRUS, 1961-1963, Vol. 22, p.162.

《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中国代表权》,第168-171页;“外交部条约司”编:《联合国大会第十六届常会中国代表权问题因应经过节要》,节要条字第二十五(五十一)号,国史馆所藏“外交部”移转档案《匪共与联合国及我国代表权问题案》172-3(目录号)/5868(案卷号)第23-25页。

《蒋介石日记》,1961年10月19日,转引自阮大仁:《由蒋中正日记去看叶公超大使去职之经纬》(四),《传记文学》第97卷第3期,第44页。

Cable to Cline from Bundy, top secret, Oct. 18, 1961, Folder China/General/CIA cables 7/61-10/16/61, Box 22A, Countries NSF, Papers of President Kennedy JFKL. 从这封电报上手写的批注来看,电报并没有发出。